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〇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七五期 ——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5e)

【史实辨析】史实与断语	沈如槐
【当事者语】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	沈如槐·陈楚三
【坎坷人生】张轶东的“一个人的遭遇”	丁 抒
【自由论坛】文化大革命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舒 云
【学术争鸣】新奇而荒谬的“文革试错论”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读后感	何 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实辨析】

史实与断语

• 沈如槐 •

十年来，唐少杰先生发表了许多关于清华文革的著作和文章，如《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二十一世纪》95年8月号）、《1968年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前后》、《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二十一世纪》95年10月号）、《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2001年3月21日《南方周末》）等。唐少杰先生为研究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存在一些史实失真和断语无据的问题。我作为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和一派群众组织四一四的负责人，特作此文，与唐少杰先生商榷。

一、史实失真

1、1966年7月底至11月，清华大学处于相对的无政府状态。当时由“清华大学红

卫兵临时总部”、“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主席团”先后出掌学校局势，但这些被称为“三临”的清华红卫兵机构并没有得到广大学生的一致承认和拥护。（《一叶知秋》第6页）

清华大学的“三临”是指：

“临筹”即“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筹委会”。7月底工作组撤出清华之前，根据中央指示，工作组组长叶林提议，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筹委会”。

“临总”即“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8月19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其领导机构称为“临时总部”。

“临主”即“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主席团”。9月16日，“临筹”主持召开校文革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由各系选举代表组成的“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主席团”。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校文革”临时主席团，不是“红卫兵”临时主席团。

严格说来，“临总”是“清华红卫兵机构”，而“临筹”与“临主”不能称为“清华红卫兵机构”。“临筹”产生于7月底，早于“自控系红卫兵”（8月4日），更早于“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19日），它是根据《十六条》产生的文化革命领导机构，具有“官方”色彩。“临主”是“临筹”的继续，同样具有“官方”色彩。虽然“三临”的领导人都是以刘涛为首的同一批人，但他们是“一身而二任焉”。

2、10月9日，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八八红卫兵三个总部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一叶知秋》第36页）

12月1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红卫兵”等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叶知秋》第118页）

1966年10月9日，是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

1966年12月19日上午，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在清华大学有“八八红卫兵”的说法，那是对“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简称。66年8月份，清华大学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八八派”成立的红卫兵，人们把它称为“八八红卫兵”；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这是“八九派”成立的红卫兵，人们把它称为“八九红卫兵”。“八八红卫兵”后来分裂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12月19日的联合，就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两个总部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的联合。

3、随着兵团成立后各纵队势力的发展，由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红卫兵（井冈山纵队）与另外三大纵队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这主要表现在对文革的理解、形势评估、工作方法、权力分配、干部政策、对文革前的清华评价方面，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就是干部政策。

……下令解散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

大多数干部自然纷纷转入在兵团内与井冈山纵队形成问鼎之势的相对温和的纵队之中。（《一叶知秋》第7、8、9页）

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唐伟为代表的纵队派。团派和纵队派都在井冈山兵团旗下，蒯大富所依赖的嫡系部队是“28团”和“31团”，所以称为“团派”。唐伟在策划成立自己的组织时，他的同伴说“我们与他们针锋相对，他们是‘团’，我们是‘纵’”，遂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纵队”。后来形成了纵队派。此时已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井冈山红卫兵”，也没有井冈山红卫兵纵队和“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的区别。

在团派和纵队派论战期间，即1967年1月至3月，两派的分歧“最重要、最直接”的并不是干部政策，而是“五个正确对待”，即以蒯大富为首的兵团总部能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能不能正确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战友、能不能正确对待运动初期受蒙蔽的群众、能不能正确对待广大的干部和教师。问题的实质是：象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和他的红卫兵政权是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不是符合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的根本目标。只是到了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之后，两派论战的焦点才集中到干部问题上。

4、5月12日和21日，谢富治来清华促使两派达成联合的四项协定，确定了扩大为22人的革委会筹备小组名单。（《一叶知秋》第9页）

谢富治两次亲临清华，主持两派的调解，并达成了两派联合的协定。（《一叶知秋》第123页）

1967年5月12日，谢富治和丁国钰、周景芳来到清华大学接见了两派负责人。

1967年5月21日下午，谢富治并没有亲临清华大学，而是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两派协商并签署了四项协议。

5、四一四总部尽管在规模上小于团派总部，但它十分重视基层建设，在基层单位共有12个部队（称01至12支队）和较完整的分部机构。四派的群众组织主要是以学生为主的东方红战团和以教工为主的三七战团，还有一个以干部为主的干部辩论团。（《一叶知秋》第156页）

四一四的基层组织，无论是前期的四一四串联会，还是后来的四一四总部，从来就没有以“部队”或“支队”命名过。四一四的基层组织大多数没有名称，只有个别单位自称为四一四某某支部或某某支队。

支撑四一四总部的柱石是四一四分部，“分部”是以学校的二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建立的。十一个系就有十一个四一四分部，这十一个系的四一四分部，是四一四的主体，因为学生大部分都在这十一个系里。除此之外，几乎每个二级行政单位都有相应的四一四分部，如200号分部、基础课分部、行政处分部、研究生分部等等。

战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它是跨越行政单位的具有相同观点的若干战斗组的集合。四一四有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分别代表四一四中的鹰派和鸽派。三七战团不是以教工为主，而是

以学生为主。

四一四串联会成立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干部辩论团，但它并不是一个常设性组织，而是为和团派就150名干部的《公开信》进行辩论而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1967年5月5日两派进行过一次辩论之后，干部辩论团就不复存在了。

6、1968年初春，当时文革已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团派某一战斗小组贴出了“清华一切党权归团派”的大标语。团派还下令清华党员到团派总部登记。（《一叶知秋》第172页）

1968年初春，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而是处于“大联合、三结合”的阶段。就全国来说，截止1968年2月底，只有15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就北京高校来说，只有少数学校成立了革委会，大多数学校还没有实现大联合。所以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才将北京主要高校的两派头头集中起来学习，要求我们“斗私批修”，早日实现大联合。当时我没听说过团派下令清华党员到兵团总部登记之事。

“整党建党”是1969年的事情。1968年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实现了所谓“祖国山河一片红。”这就为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创造了基本条件。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才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

至于所谓“党员登记”，那又是1967年初春的事。当时确有战斗小组贴出过《论清华党权必须归井冈山》的大字报，广播台也广播过总部委员刘泉的《党员登记倡议书》和《党员登记条例》。那个时候井冈山兵团还没有彻底分裂，没有什么“团派总部”之说。

7、（4月23日）清晨，四派占领旧电机馆、动农馆、土建馆、汽车楼。（《一叶知秋》第14页）

（5月1日）团派攻占材力馆，次日又攻占土建馆。（《一叶知秋》第16页）

1968年4月23日，清华大学百日武斗的第一天，414只占领了旧电机馆，没有占领土建馆、汽车楼。

动农馆和科学馆一样，早就被414“占用”。因为动农馆是原414总部机关所在地，团派的人从来就不到那里去。

汽车楼是5月14日晚上7时左右占领的，同时占领的还有焊接馆。

整个百日武斗期间414从未占领过土建馆，团派攻占土建馆从何说起？

8、5月17日，四派占领了清华西主楼。团派占领了9003大楼，旨在控制四派通往东门的道路。四派攻打该大楼，未成功。（《一叶知秋》第18页）

414绝没有攻打过9003大楼。

9003大楼是精密仪器系的系馆，位于中央主楼的西南，离主楼较远，离东门也不近。在使用长矛、砖头的所谓“冷兵器”阶段，9003大楼并不能控制四派通往东门的道路。即

使到了使用枪炮的“热兵器”阶段，9003大楼也不能控制四派通往校外的道路，因为我们不经东门而从东主楼跨过围墙的缺口到校外。

5月份，我们在研究建立414武斗根据地的方案时，曾有人提出占领9003大楼。但精密仪器系的414负责人说，9003大楼里有大批的精密仪器，还有全国高校唯一的恒温实验室，如果因为我们占领而遭到损坏，我们负不起责任。于是我们决定放弃占领9003大楼，任由团派占领。由此可见，414断无攻打9003大楼的理由。

9、5月30日。3时，团派手持长矛、大刀等武器的200多人队伍轮番进攻，东区浴室内的四派守军拼命抵抗。

4时30分许，主楼区的四派100多人前去增援，与团派阻击队伍在东大操场西边路上相遇。

5时后，四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60余人冲锋增援。

9时许，团派队伍从北、西两边攀梯进攻，把浴室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双方展开拼杀。

在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之际，四派总部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纠集大批人员，攻打团派占据的第一教室楼。……团派守军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进攻。

13时许，团派燃起的大火以及经过喊话劝降，最终使浴室守军打着白旗下楼。（《一叶知秋》第19——20页）

1968年5月30日，既然团派3点多钟就开始轮番进攻，为什么直到9点钟才从北、西两边架设云梯向屋顶发动进攻？这中间5个多小时他们在干什么？团派又是如何“轮番进攻”的？

事实是，团派发动进攻不久就占领了东区浴室的一楼，但是，他们无法攻上二楼。因为414在二楼楼梯焊了一道坚固的铁门，决心固守二楼（东区浴室只有两层）。要占领整个东区浴室必须首先占领屋顶，这是常识。因此团派很早就架设云梯，向屋顶发动了进攻，企图占领屋顶。

四派守军大部在二楼休息待命，只派几人通宵在浴室屋顶戒备，发现团派进攻，主力自然到屋顶迎敌。所谓“把浴室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不符合事实。

团派对东区浴室发动进攻以后，我们确信他们攻不下东区浴室，因此并没有马上采取救援行动，而是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出一支队伍包围第一教室楼，实施佯攻。四一四除了投掷砖头、瓦片、燃烧瓶之外，并没有攻入“一教”的行动。所谓“团派守军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进攻”，也不符合事实。

“围魏救赵”不成之后，我们就组织队伍前往东区浴室增援。我们担心在主楼通往东区浴室的路上遭到团派伏击，因而绕了一个大弯子，把队伍集中到学校东北角的高压实验室，在那里建立了基地，然后才开始行动。这个时候大概是8时左右。

开始与团派交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出动土坦克。后来因为伤亡太大，连总指挥都受重伤离开战场了，我们才出动土坦克。土坦克的指挥员告诉我，出动土坦克时间最早也在10时以

后。

所谓“4时30分许，主楼区的四派100多人去东区浴室增援”，“5时后，四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60余人冲锋增援”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最后东区浴室的守军投降了，但不是因为大火，也不是因为劝降，而是因为一名414战士被团派长矛刺中，出现气胸，有生命危险，东区浴室指挥官与团派代表谈判，团派同意派车将414伤员送医院救治，414守军才放弃东区浴室。

10、在四派那里，工宣队在27日中午时分进入主楼。四派一些人向工宣队讲“条件”，不愿交出武器和拆除工事，担心的是团派反扑，也不愿让工宣队离开，怕的是没有什么力量制止住团派。四派主要领导人已由多名工宣队员“陪行”，于13时40分写好并签署了“七条命令”，但又担心情况有变，以找发电机为借口，迟迟于16时才广播了这七条命令。然而，四派一些人还是根据其头头指示，藏匿部分武器，以防团派日后反击。

四派竭力劝说工宣队先去拆除团派工事，收缴团派武器，尚不知工宣队在同时拆除两派工事和收缴两派武器。但看到工宣队冒险把围困于科学馆近百日的四派队伍救出并带至主楼后，四派上上下下的心情才好过一些。四派头头不断催促工宣队“拿下”对主楼四派据点威胁最大的9003大楼的团派据点。

“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不存在四派与工宣队相抗衡、相冲突的问题。（《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414真诚地欢迎工宣队，积极地配合工宣队。而唐少杰先生偏偏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事实。

我所亲历的事实是：

第一，7月27日上午9时左右，工宣队刚刚抵达西主楼的过街楼，我就主动指挥414人员迅速搬开路障，引导工宣队进入主楼及其他据点，并在西主楼与工宣队进行谈判；

第二，在工宣队进入主楼的同时，我们已经命令414的武斗人员交出武器，当时确实布置藏匿了部分武器，但在下午2、3点左右被围困在科学馆的414人员获救之后，就全部上缴了；

第三，我和工宣队的领导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谈判，双方就签署了关于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协议，并于10点半左右公开广播，工宣队对此深感满意；

第四，工宣队进入414的所有据点，受到414方面的热烈欢迎和积极配合，拆除工事和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顺利；

第五，在工宣队和团派冲突期间，414组织人员给工宣队送饭送水，协助工宣队救治被团派打伤的伤员，工宣队将414视为可靠的盟友。

414欢迎工宣队、配合工宣队，是真心的、自觉的。因为我们几个月来一直都在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制止清华武斗，现在工宣队来了，我们岂有不欢迎之理？

请听毛主席7月28日是怎么说的吧：

“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做？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

“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

“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再请听谢富治8月2日是怎么说的吧：

“现在工人都说414好，团派不好。因为他们414没打工人，缴枪快，没抓工农宣传队的黑手。”

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是为了向人们说明：团派和414在1968年7月27日那一天截然不同的表现实在是“出人意料”，出乎工宣队的组织者指挥者之所料，出乎中央文革之所料，特别是大大出乎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料。正是这个“出人意料”才使得工宣队对清华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有了符合实际的认识，并在毛主席认为414是“右倾保守组织”的情况下，改变了毛主席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并最终促使毛主席抛弃蒯大富、抛弃五大领袖。这是解读清华文化大革命7.27之后那段历史的关键之点，也是解读红卫兵运动终结的那段历史的关键之点。

二、断语无据

1、至少就清华而言，文革刚进行了十个月，由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为中坚的群众组织——“四派”的成立和运行说明了清华干部队伍并没有“瓦解”。（《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回首文革》第79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至少就清华而言，文革刚进行了十个月，由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为骨干的群众组织——四派的诞生，说明了清华干部队伍并没有真正“瓦解”。（《一叶知秋》第149页）

在《新华词典》中，“中坚”一词的解释是：古代军队中主帅所在、力量最强的部分，后泛指最坚强、并起主要作用的力量。“骨干”一词的解释是：比喻起支柱作用的人或事物。

毋庸置疑，人们应该高度评价清华干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以及在414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把干部称为414的中坚或骨干力量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在414诞生之际，从秘密策划，到公开串联，从大造舆论，到建立组织，全部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所为，干部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在414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清华500多名干部中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参加了414，但这只占414全部7000人的百分之五。他们只有极少数代表进入了414的各级领导机构，但都不是主要负责人。学生，只有学生才是414的中坚或骨干力量。事实上，清华中、基层干部的大多数分布在各系、各单位，他们从来没有作为414中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或政治力量单独存在。

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大学的党政干部是依靠从党委到支部、从校部到教研室的各级党政机构发挥作用的。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政机构都已瘫痪，党政干部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都已不复存在。清华的干部队伍，上无统一的领导，下无可领导之人，作为一支队伍，应该说没有任何战斗力了。况且，在414成立的时候，这支队伍也分裂为两派。这样的干部队伍难道还不算“瓦解”了？

2、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不但自觉、主动地甚至义无反顾地站到了与团派对立的四派亦即保守的、温和的造反派一边，而且还逐渐地制约甚至支配了这类造反派。（《一叶知秋》第144页）

作为“文革”初期正宗群众组织的造反派当然不会认可昔日干部权威的再现，大多数干部转入与之对立的相对温和或保守的群众派别之中，并逐渐主导了“四派”的决策和运行。（《1968年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前后》）

文化革命中清华大学原中、基层干部是怎样“逐渐地制约甚至支配了”四派的呢？唐少杰先生“仅举清华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的事例为证”。他说：

罗征启对于文革打击、迫害干部的一些做法深为不满。他站到了四派一边，很快成为四派干部队伍及干部参谋小组的一个关键人物。

罗征启为四派所保护和利用包括清华原校级领导干部在内的许多干部，积极出谋划策，并对四派总部的若干工作制度提出过很多有效的建议。

尤为显著的是，1967年4月23日，罗征启贴出了《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的大字报，讲出了许多原清华干部的心里话。（《一叶知秋》第144页）

多么苍白无力的例证！我们认为，“制约”、“支配”、“主导”这样的词汇应该与414的重大事件或行为联系在一起。

那么什么是414的重大事件或行为呢？

我们认为，从1967年4月14日成立，到1968年8月15日解散，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清华414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做了如下六件大事：

（1）与蒯大富决裂：坚持不懈地批判蒯大富的错误，与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决裂，建立了一个政治纲领明确、组织机构严密的群众组织，打破了蒯大富的一统天下，冒着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阻止蒯大富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使其红卫兵专政始终没有披上合法政权的外衣，从而减轻了极“左”派的危害；

（2）大力解放干部：解放干部促进三结合，这是414的政治纲领。414为领导干部取代红卫兵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而大造舆论，在清华为保护和解放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把谭浩强（团委副书记）、罗征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应中（党委常委）、刘冰（党委副书记）四位干部作为典型对象，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解放干部的运动；但是也错误地批斗了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教师；

（3）坚持反对极“左”：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这是414的理论旗帜。414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反对打倒一切干部，反对冲击军队；但也犯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和个别人在个别地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

（4）创立四派思潮：与团派就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清华即党和政权的性质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任务、路线、方针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刻而又广泛的论战，形成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并在清华坚持实践“四一四思潮”；

（5）反对中央文革：坚决而又讲究策略地反对和抵制中央文革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与谢富治、陈伯达、戚本禹等中央文革的大人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6）开展武装自卫：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与团派极端分子进行了“百日大武斗”，阻止了蒯大富消灭反对派的图谋，最终与团派同归于尽，并导致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在武斗中犯了炸高压电线杆的错误。

请问，清华的中、基层干部是怎样“制约”、“支配” 4 1 4，并“主导”了 4 1 4 上述六件大事的“决策和运行”的呢？

文化大革命时代是群众运动的时代，是政治运作极其公开和透明的时代。清华大学的几个干部身居幕后，怎么能“制约”、“支配”并“主导”拥有 7 0 0 0 人的一派群众组织，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进行长期的斗争？而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一群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独立思考、决不盲从的热血青年，又怎么会任人摆布、甘当阿斗？

3、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并且在讨论和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时，给该文提供了许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观点的论据。罗征启所整理出的四派观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这些观点主要内容如下：一、“清华大学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二、“清华干部黑一点红一大片论”；三、“文化大革命翻船论”；四、“干部层层检查、人人过关就是犯罪论”；五、“文革对象为两小撮论”；六、“全国造反派分化为两大派论”；七、“两派斗争带来不同的思潮论”。（《一叶知秋》第 1 4 5 页）

罗征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唐少杰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根据，我作为 4 1 4 的领导人也从不知晓。

我在拙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中将 4 1 4 的主要观点作了一个概括，这就是：

1、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2、文化革命“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论”、“收尾论”、“转舵论”、“两小撮论”；3、针对干部的“平黑论”；4、针对群众的“平保论”；5、针对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6、红卫兵小将应该做到“五个正确对待”论、应该主动为革命干部“让贤”论；7、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8、反对冲击军队；9、反对极“左”思潮；10、“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

我认为这些观点就是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涵。

也许罗征启在文革中的确提出过许多观点，可惜我们知之甚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唐少杰先生“整理出的”七大观点。我认为，这“七大观点”并不等同于四一四思潮。这“七大观点”与四一四思潮比起来，既不系统、也不深刻，它与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涵相距甚远，说它“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恐怕有些离谱了。

在文革中，对 4 1 4 影响至深至大的只有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四一四思潮中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来自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红线主导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6 7 年 2 月 2 2 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经过周总理审阅并修改的社论《必须正确地

对待干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

这是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

67年4月6日，周总理接见经委计委建委各派代表，在谈到清华问题时讲：“十几年来，主流还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一串红线。毛主席路线是主导的。”

这是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清华的“红线主导论”。

四一四思潮不是某个人的发明创造，更不是某个人总结和归纳出来的。

四一四思潮是414群众在与团派长期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与极“左”思潮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四一四思潮是包括学生、干部和教职员工在内的广大414群众在清华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创造。

4、在这次召见中（指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毛泽东对四派的印象和评价总的来说，不如他对团派的印象和评价。但是，今天看来，1967年4月至1968年7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文革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缘于百日大武斗，毛泽东的决策才使两派殊途同归，自行消解。（《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且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你们这五员大将，包括蒯大富，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这次没有找你们的对立面来，你们回去讲一讲，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和清华414就会对我有意见。”

“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

“清华414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

“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跨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

毛主席的这些“印象和评价”难道还不算“明确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文革中的任何一派”？

而根据7·28讲话，我们又有理由推断：毛主席早就明确支持蒯大富，反对414。至少在张春桥1967年12月10日公开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后，毛主席的态度就很明确了。只是缘于7·27团派和四一四截然不同的表现，毛主席对蒯大富大失所望，这才忍痛割爱，走马换将，用工宣队代替五大领袖，亲自掌控北京高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5、正是由于百日大武斗等全国著名的武斗事件所带来的文革形势在1968年最后五个月的变化，使毛泽东及其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着手部署在全国范围或者是在清华大学里批判“四一四思潮”。这说明了，毛泽东在口头上、在思想上反对的是“四一四思潮”批评甚至否定文革的倾向，反对的是“四一四思潮”斥责和批判作为文革初期正统主力军的造反派，但是在行动中或实践中，毛泽东开始默默地、迫不得已地认可了“四一四思潮”，甚至颇为令人惊

异地实行的或应用的正是“四一四思潮”的某些观点和主张。（《一叶知秋》第243页）

对于毛主席没有部署批判四一四思潮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出种种推测。

也许，毛主席认为他已经严厉批判了四一四思潮，并将四一四思潮定性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何须旁人多说。

也许，毛主席认为四一四思潮不过是清华园内小小反对派的思潮，对全国形势没有什么影响，不必为此大动干戈，留着做个反面教材算了。

也许，毛主席认为他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是消弭造反派和工宣队之间血腥对峙的问题，此时此刻，大张旗鼓地动员群众去批判四一四思潮是不合时宜的。

然而，毛主席没有部署批判四一四思潮的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他在行动中或实践中默默地、迫不得已地认可四一四思潮。

从逻辑推理上看，既然毛主席认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老人家就不可能“在行动中或实践中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认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我们再看看事实。

工宣队执掌清华大权以后，清华成为毛主席亲自抓的典型，他老人家用迟群代替蒯大富继续在清华推行极“左”路线。迟群所总结的清华经验，经他老人家批示后流毒全国，不仅给清华也给全国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尤为严重的是，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否定了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两个估计”，一是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大多数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彻头彻尾的“黑线主导论”，与四一四思潮的“红线主导论”针锋相对，格格不入！

毛主席一直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重大贡献，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毛主席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让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不愿意违心地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于是，毛主席下决心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再次将邓小平打倒。

由此可见，毛主席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也绝对不会“在行动中或实践中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认可”任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唐少杰先生的著作中史实失真和断语无据的例子恕不一一列举。

平心而论，一个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人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只要他不存心歪曲史实，我们就不必求全责备。我们当事人坐在一起回忆历史事件时，也时而出现互相矛盾、张冠李戴的情况，我自己写的书也有不少错误，何况局外之人？

可是，唐少杰先生没有注意到自己著作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疏漏，却批评别人关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记述不是“通篇错误，不堪卒读”，就是“谬误多处，令人好笑”；不是“有一些时间、地点、事件、数字等方面的错误”，就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勉强有他看得上的，又与他的记述“在文字上如出一辙”。（《一叶知秋》第14——15页脚注）

唐少杰先生在清华工作，阅读了清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大量文革资料，采访过许多文革当事人，为研究清华的文革做了许多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自以为已经“啃”下了清华文革这块“硬核”，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以权威的口吻评论他人，这就有失学者风度了。唐少杰先生毕竟没有亲身参加过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并不复杂的历史，即使要捋清它的“皮毛”，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心血，遑论“硬核”？而面对各执一词的两派小报，面对众说纷纭的采访笔录，乃至面对白纸黑字的档案资料，也还有许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要做啊。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  
【当事者语】

回忆与思考  
——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

· 沈如槐 · 陈楚三 ·

时光荏苒，清华大学四一四和四一四思潮诞生整整四十周年了。作为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和四一四的领导人，我们借此机会对四一四思潮进行简单的回忆与思考。

四一四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清华大学两派的三次大论战密切相关。

◇ 纵队派与团派的大论战孕育了四一四思潮

1966年底的北京，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呐喊中，中央文革呼风唤雨，造反派四面出击，老干部纷纷落马，保守派溃不成军。一部分红卫兵开始反思：中央文革是否执行了“左”的路线？

1967年初，上海“一月革命”后，中央认为在红卫兵队伍中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提出了红卫兵的整风运动。又有一部分红卫兵开始反思：造反派究竟是不是代表文化革命的大方向？能不能实现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

这些反思其实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反思，而这些反思在清华进行得尤其深刻，因为清华文革受到中央高层的直接干预，清华发生的许多事件也对整个运动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正是这些对文化革命的反思才产生了四一四思潮，而四一四思潮的发展又促进了对文化革命的反思。尽管这种反思是十分肤浅的。

清华的反思主要体现在纵队派与团派进行的三个多月的论战中。

1967年元月至3月，纵队派与团派进行的论战，主要集中在“五个正确对待”问题上，即红卫兵小将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如何正确对待具有不同意见的战友、如何正确对待保守派群众、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和教师。论战的核心问题是红卫兵小将自己是否需要改造或提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抑或昙花一现？

可以说“五个正确对待”是四一四思潮的胚胎。

#### ◇ 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一次大论战催生了四一四思潮

随着夺权斗争的深入，毛主席否定了“上海公社”，提出了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的方针，干部问题开始成为文化革命的焦点之一。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提出了所谓“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另一方面，呼唤更多的干部站出来支持文化大革命。

《红旗》杂志的文章遭到了团派的激烈反对。纵队派以此为契机，接过了“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的旗帜，成立了四一四串联会，并引发了四一四与团派长达半年的第一次大论战。正是这次大论战催生了四一四思潮。

这次大论战是围绕干部问题而展开的，四一四的主要观点如“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转舵论”、“收尾论”、“两小撮论”、“平黑论”、“平保论”、“让贤论”、“勇敢分子论”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人们把四一四的这些观点统称为四一四思潮。不过，在这个时期，四一四广大群众对四一四思潮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对其中某些观点还颇有争议。

#### ◇ 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二次大论战发展了四一四思潮

江青67年1月12日关于“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讲话、团派的“大翻个儿论”和“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引发了四一四与团派的第二次大论战。这次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文化革命的目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如何认识建国十七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文化革命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彻底砸烂”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过去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这次论战主题更为集中，四一四广大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更加一致、更加深刻。此时，可以说四一四思潮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 ◇ 四一四思潮的内涵与核心

四一四与团派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尽管观点层出不穷，花样不断更新，但归根到底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十七年”，即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即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和任务。四一四的大多数政治观点就是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的。

#### ◇ 关于十七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

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红线主导论”）。

十七年来中国还没有形成特权阶层，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国的阶级关系没有发生像苏联那样的变化（“阶级关系不变论”）。

#### ◇ 关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大翻个儿”，不是“彻底砸烂”，而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部分改善论”）。

文化大革命已经揪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应该无休止地揪下去，而是应该转舵了、收尾了（“转舵论”、“收尾论”）。

文化大革命应该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个一小撮（“两小撮论”）。

针对干部的“平黑论”；

针对群众的“平保论”；

针对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红卫兵小将应该做到“五个正确对待”论、应该主动为革命干部“让贤”论；

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让领导干部取代造反派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反对冲击军队；

反对极“左”思潮；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就是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涵。

四一四思潮的矛头所向就是极“左”思潮，坚决反对极“左”思潮是四一四思潮最鲜明、最独特的理论旗帜。

四一四思潮的核心是“红线主导论”和“部分改善论”。四一四思潮中所有其他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两个观点之上的，都是从这两个观点派生出来的。“红线主导论”和“部分改善论”实质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红线主导论”是前提，“部分改善论”是结论。四一四思潮核心观点的完整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只能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最初并不是四一四提出的观点。我们当时的看法是，团派中的极端分子是一些勇敢分子，在文革初期，他们冲锋陷阵，夺权以后，他们头脑膨胀，极“左”思潮泛滥，成为各地乱局的根源，必须用铁的手腕将他们捏得粉碎，稳固政权只能依靠我们四一四。我们把这个观点称之为“勇敢分子论”。张春桥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时，将它定性为“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7。28讲话中毛主席又随意发挥，把“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改成“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对于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主席经常进行这样的“随意发挥”。

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哪一个“天下”是造反派“打”下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派便不能夺取任何一个单位的权力。造反派的“天下”都是毛主席“恩赐”的。毛主席本想让这些造反派坐天下，可惜他们的表现差强人意。毛主席说他们没有能力

单独地管理国家，单独地管理城市，连学校也不能单独地管理。毛主席还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毛主席的这些话，其实这就是说造反派不能坐“天下”。

#### ◇ 四一四思潮的实质

团派的同志早在文革中就尖锐地指出：四一四思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做了结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于这个结论，文革中我们是极力否认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结论。

“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从理论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部分改善论”，否定了全国各地、各部委的全面夺权。

“转舵论”、“收尾论”，干脆就是叫停文化大革命。

而从“两小撮论”、“平黑论”、“平保论”，到关于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让贤论”，从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到“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无一不是对文革中一系列做法的实际否定。

我们过去极力否认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因为：

在思想认识上，我们认为文革是非常必要的，是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文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是揪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和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二是广大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干群关系将会得到很大改善，三是，全民进行了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

在内心深处，我们真心崇拜毛主席，真心拥护文革，因此，我们积极参加文革，想经风雨、见世面，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实际行动上，我们拥护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不遗余力地批判“封、资、修”。

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造反派，而是反对那些变了质的造反派。对于那些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造反派，我们钦佩有加。

我们也曾一度被假象所迷惑，极力推崇“上海模式”：革命左派与老干部相结合，执行了温和的政策，使上海的形势特别稳定。

我们只是认为，打倒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群众觉悟得到了空前提高，文革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文革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大乱之后应该转向大治。我们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有不满，有怀疑，我们看出了文革中的一些问题，但还远远谈不上反对。

#### ◇ 四一四思潮的特点

四一四思潮有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开放性、群众性和实践性。

### 1、开放性

四一四思潮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开放的思潮。从内容上说，四一四思潮是四一四各种政治观点的集成。从时间上说，四一四思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逐渐形成的，是在对文化革命的反思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 2、群众性

四一四思潮不是出自某个理论家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出自某个教师爷的归纳总结。四一四思潮是一种群众性的思潮，四一四大部分观点都出自四一四中不同的战斗组和不同的个人。

四一四思潮是四一四群众在与团派长期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与极“左”思潮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四一四思潮是包括学生、干部和教职员工在内的广大四一四群众在清华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创造。

### 3、实践性

四一四思潮不仅仅是一种思潮，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实践，是在清华文革中有几千人参加的、历时一年之久的、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实践。四一四坚持不懈地将自己的每个观点都付诸实践。这种政治实践是血淋淋的实践，不少四一四群众在这种政治实践中付出了自己的鲜血，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 ◇ 四一四思潮的深厚基础

人民群众中自发的反“左”力量是四一四思潮的深厚基础。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一方面强调我国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一个悖论。我们曾经指出，清华之所以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并形成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主要是对这一悖论的理解和认识不同。四一四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进行的革命，必须实现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如果你破坏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极“左”。团派认为：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理论的精髓就是继续革命，而且既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如果你反对这一原则，你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你就是极右。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团派与四一四斗争的实质是极“左”思潮与反对极“左”思潮的斗争。

既然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么团派与四一四斗争的实质为什么不是坚持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呢？

这是因为：对于四一四的主流而言，当年，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更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勇气去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四一四并没有创造出什么高明的理论，四一四思潮所表达的观点绝大多数是当时《红旗》



杂志、《人民日报》以及《文汇报》所公开提倡和宣传的观点，很多精神都出自中央甚至毛泽东主席本人。四一四的创造性就在于：我们从铺天盖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宣传中“挑出”了这些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和政治主张，并在清华大学坚持和实践这些政治主张。我们认为这些观点真正体现了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就是因为四一四凝聚了一批善良的平民百姓，坚持自己的信念，敢于用毛泽东思想去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

四一四思潮的理论旗帜是反对极“左”思潮，四一四观点的主要形态是反对极“左”思潮。从四一四成立之初，到武斗前夕，四一四一直高举反“左”的旗帜。初期反对形“左”实右，后来反对极“左”，四一四反“左”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四一四思潮代表了人民群众中自发的反“左”力量，反映了人民群众结束政治动荡、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基本愿望。这就是四一四思潮的根基。

#### ◇ 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点

以“左”反“左”是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点。

四一四反对极“左”，是以“左”反“左”，或者说是以小“左”反对大“左”。这是因为四一四所坚持或主张的许多东西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产物，四一四的不少实践活动也是受“左”倾错误影响的。

从实际行动上看，在校内，四一四批斗“走资派”，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右派分子，甚至批斗持不同观点的普通教师；在社会上，四一四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高喊“打倒刘邓”；还有少数四一四群众参与了几大极“左”事件。

从政治观点上看，四一四思潮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左”的东西。从“红线主导论”到“阶级关系不变论”，从“两小撮论”，到“十七年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等等，都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观点的反映。

在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观点“红线主导论”中，我们全盘肯定建国十七年后毛主席领导的所有运动，如反右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四清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苏大论战等。实际上，解放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客观规律没有充分的研究和正确的认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不过是毛主席左倾思想指导下的盲动。这些运动伤害了党，伤害了干部，伤害了知识分子，伤害了人民群众，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民主法制的建设。而通过这些运动，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不断发展，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文化大革命正是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我们全盘肯定这些运动，就是接受了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

文革前我们受到了正规的传统教育，但是在传统教育中也包含了很多“左”的东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修防修”已经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牢牢扎根。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政治语言都已打上了深深的“左”的烙印。

因此，四一四思潮虽然对文革有所反思，但这种反思是十分肤浅的，无法上升到共产党必须纠正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高度，无法上升到共和国必须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无法上升到党和国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

我们之所以纪念四一四思潮，是因为我们“有幸”参加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我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我们也给历史留下了经验和教训。我们——文革时期的年青一代——包括团派和四派，既非神仙圣贤，亦非妖魔鬼怪。我们思考过，我们奋斗过，我们无怨无悔。

二零零七年四月

~~~~~

【坎坷人生】

张轶东的“一个人的遭遇”

• 丁 抒 •

读完张轶东的回忆录《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挥之不去是“一个人的遭遇”这几个字。

“一个人的遭遇”，这是四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电影系由肖洛霍夫同名小说（又译“一个人的命运”）改编。主角索科洛夫在苏共革命后参加过红军。在后来的大饥荒中，亲人全都饿死。他和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姑娘结婚后，才有了一个家。一九四一年德军入侵苏联的第三天，他告别妻子和一子一女，上了前线。他是司机，一次往火线送弹药时军车被击中而成为战俘，被送往德国集中营服苦役。利用被指派给德军的一个工程师开车的机会，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车子连同德军工程师带回了苏联。回家探亲时他才知道，妻子和女儿已死于德军的轰炸。在战争胜利前夕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儿子也牺牲了。战后，他给集体农庄开车，收养了一个战争孤儿万尼亚。只因开车撞了农庄的一头牛，他就被开除了公职，带着万尼亚四处流浪，犹如“被苦难的生活抛弃在路边的两粒沙子。”（肖洛霍夫语）

中共认为，这部电影渲染战争苦难，宣扬人性论，是毒草。先是禁演，后来作为反面教材在少数场合放映以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一九六三年春，清华校方为了对毕业生进行“服从祖国分配”的教育，也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对苏共的批判，给毕业生免费放映了两部电影。我是一年级新生，与也是毕业生的哥哥一起进礼堂观看了那两部电影。一部是中国人拍的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意思是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党放在哪里就在那里生根。即便到了昆仑山的兵站，也要像昆仑山上的一棵草，扎根在那里为党服务。另一部就是《一个人的遭遇》。

张轶东在他这部回忆录里写道：“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我从《真理报》上读到了肖洛霍夫所写的《一个人的遭遇》。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今后的遭遇不会比他笔下的那个索科洛夫更好。而我那‘苦难的历程’则将比阿里克赛·托尔斯泰小说主人公们的苦难历程更加漫长。”

的确，张轶东大半生的遭遇，比《一个人的遭遇》里的那个索科洛夫更为坎坷，苦难更甚。他的苦难不仅远比索科洛夫漫长，也远比阿·托尔斯泰的小说《苦难的历程》里的主人公的苦难历程更为漫长。

而张轶东的坎坷苦难，就是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

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张连科是一个留日归国的炼钢专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任上海第三炼钢厂厂长。在抗日战争初期迁厂入川，与另一迁川的汉阳铁厂合组成非沦陷区最大的钢铁厂，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因积劳成疾，他的父亲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一九四八年，还是北京迁渝的清华中学高二学生的张轶东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到了北京。那时他的哥哥已

是清华大学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哥哥的影响下，他也成了一名“进步学生”。一九四九年中共进城后，哥哥参军南下，大弟弟也参军去了朝鲜战场。张轶东开始学习俄语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一九五一年七月，他一、二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已是北大党委专职干部的程贤策把他找到党委会，告诉他，党决定派他到苏联去学习。八月间，他进入了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

张轶东努力学习，成绩优秀。他二年级时写的论文《七至八世纪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已接近毕业论文的水平，他的照片也上了历史系的光荣榜。一九五六年毕业时，中国大使馆同意他留校做研究生。回北京过了暑假后，又回到列宁格勒深造。

但是，一九五七年中共主席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把他的命运拧了一个大折。对这场“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曾这样作总结：

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是在一九五七年。

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一九五七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

在那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远为酷烈的运动中，全国计有一百万人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的“帽子”。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定为“右派言论分子”、“烂言分子”、“疑似右派”，或者“以所谓‘右派言论’戴上其它帽子”！这一百多万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六十万以上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的工人、店员、农民等，不计在内）

张轶东的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弟弟被划为“中右”分子，赶出军队，发配至广西十万大山的僻远山沟。留学生也不能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一九五八年国内各单位搞“反右补课”时，党也在留苏学生中进行组织“清洗”，连中共元老方志敏烈士的儿子都被打成“右派”遣送回国了。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里有四人被划为“右派”而遣送回国。

张轶东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善于独立思考的他，不盲目随从。党支部认定他“只专不红”、对党的政策“抱怀疑态度”，没收了史学前辈雷海宗、向达给他的信件，因为雷、向都是“大右派”。

张轶东躲过了反右运动，可是紧接着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又搞起了“拔白旗”运动。张轶东成为留学生中的靶子。他被大字报围攻，并被强令“向党交心”。交了三次心均不获通过。留学生党支部将他的材料往大使馆一报，他就被“遣送回国”，从此成为一个贱民。

一九五九年初，张轶东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上半年，政治气氛似乎不那么肃杀，他曾经希望可以凭借其苏联籍妻子还在列宁格勒的关系重回学校，完成其研究生论文。可是七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又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南海里批斗彭德怀元帅的吼声虽然传不到红墙之外，反右倾却无远弗届，谁也躲不了。

张轶东的家与中南海仅一街之隔，距离不过百米。他再次成为“运动员”，被要求“向党交心”。这一回他铁了心，在党要他“交心”时斗胆回答了一个“不”字。自然，很快就有了后果。年终奖金分四类，最低的“四类人员”得零元。零元奖金获得者只有三人：两个右派，加上张轶东。

这个“四类人员”，论文也不能发表了。张轶东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他的妻子克拉娃积攒了一些钱，还收到了张轶东在苏联发表的论文的稿费，有了来中国的路费。可是政治原因使得她来不了中国。张轶东以为离开北京到哈尔滨去是一条出路。他希望调动到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分院继续研究历史，可是“组织上”却把他派到了黑龙江省安达市（今大庆市）的工业器材采购供应站。一九六二年，他又被调到绥化，在县第一中学担任俄语教员。

他不在乎“大材小用”的闲话，卖力地教学生，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辅导学生，并帮助家境困难的学生。学生可以随时到他的单身宿舍求教。他赢得了学生的尊敬，这使他欣慰，但是他更明白，“政治”上已入了“另册”的他，教学再好也白费！

中苏关系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他和妻子克拉娃团聚无望，终于在一九六五年离了婚。几乎同时，他被公安局传讯了。几位北京下放到黑龙江的友人被归纳进了“张轶东反动集团”。这时他才明白，长期以来他就是一个被监控的对象。苏籍妻子实际上是他的保护伞。离了婚，保护伞也就没了。

不过，要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搞起“文化革命”，张轶东才知道，过去的磨难都不算什么，真正的灾难还在后面呢。

“文化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是注定跑不脱的。“老修”是他的外号，所有的大字报都称他“老修”。“黑帮”都被勒令将身份牌挂在胸前。他的牌子上写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月中，毛泽东曾说“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其实，毛泽东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短时间内全国自杀者超过十万人。张轶东有一小瓶灭跳蚤用的毒药“敌敌畏”。他裤袋里藏着那只小瓶子，在头脑里进行生与死的斗争。他想起了家人。他知道，要是他“畏罪自杀”，弟弟妹妹将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他不能只考虑自己。

当张轶东在绥化放弃自杀时，并不知道他的同班同学、当年选拔他去苏联留学的那个北大党委委员程贤策，已经自杀，用的正是“敌敌畏”。他也不知道，他父亲张连科在重庆钢铁公司的墓地也被捣毁了。墓碑被砸碎，遗骨被毁弃。

绥化两个“革命群众”组织打派仗、顾不上批斗黑帮时，他的处境稍有改善。不敢收听苏联广播已达一年之久的张轶东又重新拧开了收音机。不过这使他以后被处置时罪行又增添了一条：“偷听敌台”。

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是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被枪决。在绥化县，一名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干部被枪毙，罪名是上书毛泽东，批评中共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即走在了一条错误道路上。

全国死于“清理阶级队伍”者在五十万人以上。邻近绥化的海伦县，有一位小学校长投井自杀。十三年后张轶东再婚，妻子就是那位校长的女儿。

绥化一中的两派“大联合”之后，再度寻找“阶级敌人”。张轶东是学校第一号斗争对象。但是，即便在批斗会上他仍然坚持其“反动观点”。校园里到处是“强烈要求公安机关逮捕反革命分子张轶东”的大字报。他的收音机被没收，送到了绥化县阶级斗争展览展馆。

一九六九年九月底的一天，张轶东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离开绥化一中校园，进了“社会

学习班”。多年后他才知道，那是一次各地同时进行的大搜捕行动。一九七五年在辽宁省被处决的女烈士张志新，也是在这天晚上被捕的。

“学习班”实际是个准监狱。审讯张轶东的公安人员与各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一样自称“政府”。个人物品存放储藏室时，填写的单子是“犯人存物单”。“学员”排着队在街上走时，市民们都说是“劳改队”来了。搞防空演习时，管教员逼着学员跳下菜窖，大叫“都往里跳，摔死一个少一个！”

只有一点不那么像监狱：“学员”得按月交出自己的粮票，以及高出实际饭钱一倍的伙食费。

一九七〇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紧接着又是“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简称“一打三反”运动。

以思想言论定“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打击对象是所谓“历史反革命”。“一打三反”的目标则集中于“现行的”，即“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就是张轶东这样的人。

“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司法程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北大数学系青年助教任大熊、清华大学学生刘世广，就是在那时被枪决的。

张轶东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他有“思想极端反动”、“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偷听敌台，预谋投（苏）修”等等大罪。二月间，也就是当了五个月准犯人后，他被“依法拘留”，戴上手铐，成了看守所的正式囚犯。

死刑的阴影笼罩着他。他知道中国的传统：死刑犯在被处死前可以提点要求。他打算到了那一天选择听音乐：他钟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以及乌拉尔民歌《山楂树》，或者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或约翰·斯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活》。他对自己说：“或许他们还是会同意的吧！”

一九六五年张轶东和苏联籍妻子克拉娃被迫离婚后，还保持着通信。文化革命后，他们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他最后的愿望是见到克拉娃一面。他打算在难友中找个可靠的人，写遗嘱说自己的一切遗物都送给他。交换条件是此人被释放后将他的骨灰带到中苏边境，洒入黑龙江。“黑龙江从哈巴罗夫斯克到鞑靼海峡的那一大段在苏联境内。”他这样想，“我的骨灰在这一江段中漂流，就离克拉娃最近了，而且不需要办理任何护照。这样我就能实现我这一生最后的愿望了。”

不过，他终于未被判处死刑。过了七个月，即九月间的一个星期天，他被绳子捆绑起来，挂上写着“反革命犯张轶东”的牌子，名字被划了叉，与另外十三名囚犯一起，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举到敞篷大卡车上，沿车边朝外跪着，拉到县中心广场，在群众大会上听取宣判。对他的判处是有期徒刑中最长的二十年。

从离开列宁格勒大学那天算起，历时十二年，他最终进了离他曾经工作过的安达市不远的新肇监狱。

中共的监狱劳改制度，本来是从苏联学来的。就是在张轶东入狱的一九七〇年，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为其揭露苏联监狱制度的作品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张轶东不愿意在狱中虚度二十年。他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忍着饥饿，偷空着手写书，名为《中国与世界文明》。不幸当他写到阿拉伯征服和阿拉伯文化时被人发现，“著书梦”就此被打断。

他算过：二十年是七千三百天，漫长的七千三百天。但是他想：“这个暴政已经持续十二三年了，难道还能再维持二十年吗？”“如果这种暴政要维持到一九九〇年的话，那么不仅我张轶东一人，整个中国都要完蛋了。”“毛泽东总不会活到一九九〇年九十七岁时才死吧！”“不用等二十年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判我二十年不等于我要在监狱里呆上二十年！”

这个信念支持他活了下来。一九七六年三月八日那天，张轶东站在监舍外目睹了世间罕见的陨石雨。读过许多历史小说的他，隐隐觉得此天文现象有些怪异。这时离他刑满的日子还有整整十四年。他觉得说不定哪天形势改变，他将会提前出监。九月里，狱中突然公布了毛泽东死去的消息。张轶东一下子就明白了：

“一个历史时代说结束就结束了！”

不过，张轶东在新肇监狱又呆了两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平反走出监狱，结束了九年多的牢狱生涯。

八十年代张轶东去海参崴时，遇到了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时的一位苏联同学。他委托老同学寻找前妻克拉娃。一九八九年，那位已是苏联著名远东考古学家的老同学给他送去了关于克拉娃的最后消息：几年前五十周岁生日时，她被证实得了癌症。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张轶东说：“在巨大的历史运动中，一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我可以把自己二十多年来受过的不公正待遇和苦难放在一边。可是虽然暴君死得比克拉娃早十年，我毕竟无法忘怀究竟是谁使我此生终于未能（再）见到克拉娃。”

“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这是杜甫诗《新婚别》里的名句。苏联姑娘克拉娃二十三岁时嫁与中国留学生张轶东为妻，不日即开始了“远书归梦两悠悠”的痛苦生活。先是列宁格勒和北京，继而是列宁格勒和黑龙江。“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克拉娃痛苦而又短暂的一生，以及张轶东的“一个人的遭遇”，涵盖了一个大时代中的三十年。这部《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不仅记录了张轶东个人的苦难史，更是毛式“社会主义”的全景录像，为当代中国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

## 【自由论坛】

### 文化大革命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 舒 云 •

读完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深感震惊。

周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甚至没有中国和世界的未来。（1）文化大革命是人类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必然探索过程。（2）文化

大革命是有史以来魄力最大，深度最大，广度最大的革命。（3）任何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坚定理论信仰的知识分子，处在毛泽东当时的地位，都必然孤注一掷发动文化大革命。（4）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腐败。周先生肯定地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反腐败的理论（5）。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事件，曾害得亿万人家破人亡，并差点把整个国家拖到灭亡边缘。在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的今天，周先生居然欢呼文化大革命，而理由居然是文化大革命能抑制腐败。

文化大革命能抑制腐败吗？这真是奇谈怪论。

诚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确实文化大革命利用群众运动，不分青红皂白打倒了除毛泽东、江青等少数人外几乎所有位于权力顶端的高官和广大干部。但是“走资派”并不等于“腐败”，文化大革命的宗旨也没有反腐败。那时批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对老百姓、对国家都有好处的所谓“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等政策，这不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着力实行的政策吗？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养只鸡，都被批为资本主义。最后搞的中国经济面临崩溃。

文化大革命解决了权力和资本交易引发的腐败吗？

目前最令中国政府头痛的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就存在。那时的毛泽东权力大无边，无人能够监督。仅举几个小例子，当八亿人都在毛泽东领导的有关单位命令下不能看旧戏曲时，惟有毛泽东可以随意点看，而且还专门为他一人摄制和播放。因为毛泽东送了几个跟他一起跳舞的演员上大学，所以他反对批以权谋私的“走后门”。还有很多毛泽东享受的特权，比如他自己有专列，上面有办公室有卧室，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去长江游泳他就一定要去游，根本不管国家动用了多少警力和物力。毛泽东经常去的城市，包括他的老家韶山，在中央办公厅的安排下，都专门给他修了如宾馆一样的高级房子，他不去住就闲置在那里。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启用了他的妻子江青为他冲锋陷阵，到党的十大时又选拔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仅以这两个人为例。江青不仅在政治上为所欲为，还养狗养猴。她去外地都是飞机伺候，还要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甚至她喝的水，吃的东西也要用专机送。至于霸占抄家文物，更是公之于世的旧闻。王洪文这位年轻人更是腐败到顶，住进高级别墅后，他成天打猎、玩牌、酗酒，变着花样地大吃大喝，最后连毛泽东也对他不满意了。

不能把责任全推到毛泽东和江青、王洪文等人的身上。

其实一些掌权人原本并不是贪官，但随着权力和私欲的膨胀蜕变了。像王洪文这个工厂的基层干部原本是朴实无华的，为什么大权在手，很快就极度腐败了呢？这就是因为权力无人监督。

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权力由谁监督的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致使腐败越演越烈。为什么高官腐败屡禁不止呢？“一把手”的权力太集中了，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难度大，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又无法监督，人大监督则隔着一层皮，而群众监督知情有限；舆论监督又常遇阻力。虽然从2003年起，由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监督的规章制度，但至今仍没有形成有效的上下结合的民主监督机制，尤其是对第一把手的监督仍是难题。

如何治理中国的高官腐败，关系到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只有真正从制度建设上铲除“一把手”腐败的现实土壤，才能从根本上抑制一把手的腐败。

综上所述，腐败的克星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当前的腐败与发展市场经济有关，只能依靠党内有效的对第一把手的民主监督机制和法制，健全市场经济机制解决，而决不能靠文化大革命、靠群众运动解决。

注释：

（1）周泉缨著《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银河出版社2006年12月版，526页。

（2）同上，3页。

（3）同上，412页。

（4）同上，496页。

（5）同上，37—38、298页。

~~~~~

【学术争鸣】

新奇而荒谬的“文革试错论”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读后感

• 何 蜀 •

一打开这本书，就感到新奇而荒谬。作者在扉页上郑重地列出了这样几行展示其主旨的文字：

高举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
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路线，
构建“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

在哲学上我们的第一导师是佛祖释迦牟尼；
在政治上我们的第一导师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
在科学上我们的第一导师是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这几行文字想说明什么？作者标新立异地把这几句话并列在一起，把这三个“我们的第一导师”并列在一起，又是要说明什么？这里的“我们”，除了作者本人外还能代表谁？

再一看开头的《作者自序》，一上来就说，作者在2005年底出版的第一部哲学专著《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展示我1997年创生的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二元论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的论著”（第1页，在后面202页又说“我首创了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读到这里，真叫人瞠目结舌，怀疑作者的头脑是不是出了毛病，一个人怎么可以自吹其创生了“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这种“最先进最正确”的说法，使人仿佛回到了那个全民发疯的狂热、愚昧年代。不过，就是在那个年代，“最先进最正确”也只能用于歌颂伟大领袖或其“亲密战友”、“伟大旗手”等极少几个人物，也没有谁敢用来自称。

读这本书需要有耐心。因为它太庞杂，太混乱。既有对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回顾，又有对

作者自创的所谓“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体系”的反复宣讲。既谈佛祖的“缘起说”，又谈现代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既谈个人遭遇，又谈世界大势……不过，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作者在书名中就直截了当提出来的“文革试错论”。

作者认定：“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社会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伟大的历史性试错，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类似文革的试错，人类就无法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3页）

把只在中国发生的、为其他各国民众所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就无法探索和寻找到理想社会模式的“试错”，这本身就是强加于人，是一厢情愿的虚夸之词，就跟当年说中国要“解放全人类”一样的荒诞。再说，作者认定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社会模式”是什么呢？书中一再明确提出，就是现代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和谐社会。而这个“瑞典模式”的理想和谐社会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作者说：“在两极冷战的国际大环境的压迫下，西方社会被迫重新调整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关系，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自在地创生了现代瑞典模式社会（和谐的福利社会）”（13—14页）。

在这里，作者自己就把他提出的不通过文革这样的“试错”就无法探索和寻找到理想社会模式的说法推翻了。

作者这类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书中时时可见。

把文革说成是“试错”，这是作者的发明，也是作者根据其自认为经过“顿悟”后创生的“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得出的高论。

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历史永远是一部试错史……人类唯一的正确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是：任何历史事件，只要其总体上讲是人类历史上首创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对人类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是必要的，因此人类为其付出的代价必然是值得的，因此这个事件的历史价值，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包括重复出现的破坏性事件和建设性的事件所无法比拟的。”（312—313页）

按照作者的这一“理论”，曾经给全人类带来极大祸害的法西斯主义，是不是也算“试错”？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不是也算“试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不是也算“试错”？它们不是都能满足作者提出的“其总体上讲是人类历史上首创的事件”这个条件吗？作者为了强调“首创”对于“试错”的重要性，还特别说明：这种首创的事件“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包括重复出现的破坏性事件和建设性的事件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只要是“首创”的而不是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无论是破坏性的或建设性的，都算“试错”，其价值都是那些重复出现的事件所无法比拟的，“人类为其付出的代价必然是值得的”。

作者没有说明（我相信他也无法说明）。如果这类“首创”的历史事件都可以美其名曰“试错”，那么，谁有权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推入水深火热的浩劫中来“试错”？谁又愿意让自己卷入这样的大灾大难中备受折磨甚至死于非命去“试错”？

作者用治疗癌症来打比方，但是这个比方是很不恰当的。首先，医生治疗病人决不是“试错”，否则，谁还敢找那些以“试错”为宗旨的医生看病？其次，即使是对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进行临床试验（姑且说是“试错”吧），也得事先如实告知接受试验者可能面临的后果，而且还得签订相关的合同。不告知，或者用美好的言词进行诱骗，甚至强迫别人接受这样的试验，甚至拿无辜者的生命来做实验，那不是成了当年日本皇军的七三一部队？难道那些死于七三一

队的冤魂“付出的代价必然是值得的”？

从“文革试错论”看，似乎作者是在以一种新的说法来肯定文革。不过，此论的新奇之处就在于，作者的肯定文革，与现在那些坚持美化和肯定文革的新老左派大不一样，一般新老左派肯定文革的前提，是认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和必需；而“试错论”的发明者却是在坚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前提下肯定文革。作者指出：“文革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主要功绩，是文革全面揭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含自身不可克服的悖论，这个悖论就是用世界上最自私、最不平等、最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和手段，去谋求所谓的最公正、最平等、最善良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22页，在书中259页，作者加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前面的三个“最”是“最残酷、最血腥、最不平等”）作者给无产阶级专政加上的这些“最……”，足以让新老左派们气破肚子。

从书中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混乱。比如，作者一会儿说，文革中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了文革前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先进人民”和“普通人民”两个阶层（22页、262页），一会儿又说，文革中知识阶级（指红卫兵）内部的两派斗争，与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27页）。这些说法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荒唐可笑的。作者自认为是在经过“顿悟”后创生的“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总结出来的，其实这样的认识与文革中坚持派性斗争时候的宣传，与宣讲儒法斗争史时候所鼓吹的那一套，又有多少区别？

此书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庞杂、混乱，不过，也并非通篇狂言呓语，其中也不时会出现一些见识颇为独到和深刻的文字，如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自私、最不平等、最血腥、最残酷”的评价，又比如：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狭小的民主，它的发展大趋势只能是唯意志、唯权力、唯暴力”。（163页）

“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文革领袖和文革群众，就像大型机械粉碎机里永远在相互拼砸的大小‘铁块’，自觉或不自觉地最终只能砸烂对立面的同时也砸烂自己，而不可能建设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24页）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方式，实际上是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初期，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方式——砸机器的方式的放大而已。它本质上就是用人力的力量去消灭和对抗历史必然产生的自在的社会事物：机器、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制度等等。”（251页）

还有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文革路线的分析等等，也颇有独到之处，能给人以启发。只可惜这些亮点被大量的“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体系的自我吹嘘所冲淡、淹没了。

周泉缨的这本书，使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近年来，逐渐有些当年的文革风云人物开始写回忆了，这是很可贵、很有意义的事，对还原历史真相非常重要。只是，有人在写回忆时，依然摆脱不了当年指点江山、呼风唤雨的姿态，老是想要端起一付天降大任、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的架势，把自认为有利于“解放全人类”的、“最先进最正确”的思想观点趁写回忆之机灌输给读者。其实，他们应该明白，对他们来说，最有价值的，只是他们所亲历、所了解（甚至可能是只有他们才了解）的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史实，而不是他们对那些史实的认识。他们需要做的，应该是尽可能完整地、不加掩饰不作虚构地把那些史实写出来告诉读者，留给后人，而不是向读者兜售他们的那些自认为“最先进最正确”的认识。

最近读到一篇署名“歪脖子树”的文章《无胆虎山行 打狗论英雄——〈聂元梓回忆录〉引起话题》（载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华夏文摘增刊 5 6 2 期·文革博物馆通讯 3 9 6 期》），我很赞同作者在文章最后对聂元梓的建议：“对着孑于暮年的聂女士，我有一个建议：建议她转换一下角色。由‘辩护人’的立场转移到‘见证人’的立场。”我想，对正在撰写或有志于撰写回忆录的当年风云人物们，这个忠告都是适用的。不要只想当为自己辩护的“辩护人”，也不要当还想为人类开出济世良方的“救世主”，就当好一个“见证人”吧。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